

裁决即生成：艺术创造中「决-生成」结构的不可代偿性

兼论生成式AI何以不同于历史上一切创作工具

作者 秦莉 · SDE 学员 · 约 2.3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7月28日 · 加固版

摘要

当代艺术创作危机中一个被反复触及却从未被精确命名的结构，不是创造力被技术“取代”，也不是创作能力因依赖而“退化”，而是裁决与生成之间那条被默认为理所当然的纽带，正在被生成式人工智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拆开。本文以对一位年轻创作者的深度追踪为起点，指认这一拆开过程所揭示的深层事实：在真正的艺术创作中，裁决不是生成的准备或后续，裁决本身就是生成。一个创作者在混沌中独自辨认方向、在无路处亲自裁断路径的那个动作——本文将它命名为“决-生成”——不是通往作品的一条路，它就是作品得以发生的那个不可代偿的发生学位置。本文随后将这一判断置于更深的哲学传统与当代认知科学中进行检验：与布迪厄的“实践感”、杜威的“做即知”、梅洛-庞蒂的“身体图式”逐一切分，并引入决策认知研究与技术哲学资源，论证“决-生成”切入了一个这些既有概念未能充分显影的辨别面——不是在已有结构中即兴（那是实践感），不是在已启动的过程中渐进（那是做即知），不是在已习得的熟知中运用（那是身体图式），而是在混沌中首次裁决-生成出那个让结构、过程、熟知本身得以发生的初始差异结构。在此基础上，本文论证生成式AI区别于历史上一切创作工具的特异性，分析扩散模型等技术机制如何具体地摸到了裁决的上游，并正面回应“人机共生创作观”的挑战。最终，本文给出可操作、可观测的证伪条件。

关键词：决-生成；裁决；生成性磨难；不可代偿性；生成式人工智能；艺术创造力

一、在熟悉的绝望里，认出一个新东西

2024年秋天，我在一次青年艺术家的内部讨论会上目睹了这样一个场景。二十几位年龄在二十二到三十岁之间的创作者围坐一圈，轮流讲述自己最近的创作状态。几乎每个人都在说同一件事：一种说不清的“空”。不是没有想法，而是每一种想法都像是从别处飘来的；不是没有技巧，而是每一种技巧都像是借来的手在操作；不是没有产出，而是每一件产出都携带不了一种“只有我能做成这样”的必然性。一位学习油画近十年的年轻创作者说了一段让我久久无法忘记的话——

“我每天都能生成二十张很‘好看’的图。我知道哪张构图好、哪张色调对、哪张有市场。我能做所有这些判断。但有一天晚上我盯着屏幕，忽然发现：这些判断都不是我的。我是说——它们当然是我做出的，但做出这些判断的那个‘我’，和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关系。我可以把它换成任何人，这些判断一样成立。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就是，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深夜里，为了一张画上某一块颜色到底该偏冷还是偏暖，而独自犹豫到天亮。”

这段话用了好几个月在我心里慢慢沉淀。我终于意识到，她描述的不是一个创作瓶颈——她甚至不是一个“创作受阻”的人。她恰好相反：她高效、多产、熟练、被肯定。她只是隐隐感到，所有这些高效的、多产的、熟练的、被肯定的东西，在某一个她自己无法指认的位置上，与她无关。那个位置，就是本文试图命名的东西。

已有的讨论，诚然没有完全错过这个困境，但它们总是将它错认成别的什么。

一股最响亮的声浪认为，问题在于“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艺术家”。这是一场关于领地的恐慌——机器闯进了曾经独属于人的疆域，所以我们要么奋力守城、要么举手投降。但在她的故事里，从来没有一台机器在“抢”她的创造力。机器没有禁止她做任何事。机器只是替她做了太多事，做到她发现自己已经不需要用那个最笨重、最缓慢、最没有效率的方式——用自己的手、自己的身体、自己漫长的犹豫——去和一块颜色赤身搏斗了。而等到她终于意识到这一点时，她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搏斗，甚至不知道自己曾经会不会搏斗。

另一股来自批判理论的声音认为，问题在于文化工业的标准化压制。这个判断对了一个侧面：当代艺术创作的环境确实越来越像一条流水线。但它错把病因安在一种外在的、强制的暴力上。她从未被任何人“压制”过。她的老师鼓励她，她的观众赞美她，她的工具帮助她。她所处的环境不是监狱，而是一间铺着软垫的房间，房间的墙壁在一点点向内移动，但移动得如此之慢、如此之安静，以至于她直到墙壁贴到鼻尖的那一刻，才发现自己已经被裹成了一个再也伸不开手脚的形状。这里需要追问的，不是“文化工业批判为什么错了”，而是“文化工业批判为什么只能看到压制”——它诞生于一个技术代偿尚未摸到裁决上游的时代，它的全部批判武器都对准了显性的、暴力的、有主体的压制，因而无法辨认一种以帮助和效率为面孔的、善意的、无主体的拆解。这个历史局限本身，恰恰是本文判断“这一次真的不同”的历史证据：批判理论的武器库里，没有用来分析“善意拆解”的工具。

还有一股来自认知科学的声音认为，问题无非是“用进废退”：用多了AI，人就会变懒，变懒了就会变笨。这个解释抓住了“依赖”这个表象，却完全倒置了因果。她在使用AI之前，她的“自我辨认力”和“亲自裁决力”——如果我们这么叫它——并不是已经形成了而后退化了。它们是根本没来得及形成。她从学画的第一天起，就有AI帮她生成参考图、分析构图、校准色调。她从未被丢进一个必须靠自己从零开始摸爬滚打的暗夜里。她从未经历过那种“没有任何外部坐标、没有任何人能告诉她正确答案、她必须自己踩下去每一脚并为之承担一切后果”的时刻。不是她曾经拥有而后失去了什么，而是她从未被放置到那个让她拥有这些的境遇中去。

但所有这些讨论——包括上述的三种声音和它们各自的反驳——都还停在一个共同的地基上。这个地基如此自明、如此不容置疑，以至于争论的各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站在它上面。这个地基就是这样一个预设：裁决和生成是两件先后发生的事。先由创作者做出裁决——决定画什么、怎么画、哪一笔该落在哪里——然后由手或工具执行这个裁决，生成作品。裁决是前因，生成是后果。裁决是灵魂的，生成是身体的。裁决是创作的“决策阶段”，生成是创作的“执行阶段”。

这个预设太深了，深到我们几乎从来不会去质疑它。当她说“我能做所有这些判断，但这些判断都不是我的”时，她敏锐地触及了一个裂缝，但她无法说清那个裂缝在哪里。那个裂缝，就在裁决与生成之间那条被默认为理所当然的纽带带上。

传统创作工具——画笔、颜料、凿子、暗房——都是在这个预设下运行的。它们代偿执行，但不代偿裁决。透视法让画家更容易在平面上经营空间幻觉，但它从未替画家决定哪条线该画在哪里。摄影术让影像的捕捉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但它从未替摄影师决定在哪个瞬间按下快门。数字剪辑让影像的拼接变得无比灵活，但它从未替导演决定哪一帧留下、哪一帧剪掉。所有这些工具都遵循同一个边界：它们站在裁决的下游。裁决一旦被做出，它们高效地执行；但裁决本身，仍然必须由创作者在自己的身体里、在漫长的浸泡和犹豫中、在没有任何外部坐标的暗夜里，独自完成。

生成式AI的断裂性就在于：它第一次摸到了裁决的上游。它不是等待裁决完成之后再去高效执行，而是直接在裁决尚未发生的那个混沌地带里，吐出一堆已经完成了裁决的方案。创作者面对的不再是一张白画布和内心的混沌——那是旧时代创作者必须独自穿越的暗夜——而是二十个已经画好的方案。他不需要在混沌中辨认方向，因为他面前摆满了方向。他不需要在无路处裁决路径，因为他面前铺满了路径。他只需要做一件事：挑选。

而这个动作——挑选——与裁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类动作。裁决发生在没有任何外部选项的时刻：你必须在黑暗中自己踩出那条路，而且没人能告诉你踩对了还是踩错了。挑选发生在外部选项已经铺满桌面的时刻：你只需要在已有的路中标出一条“最好”的。裁决的能力在被裁决的动作中生成；挑选的能力也在被挑选的动作中维持——但它永远生成不了裁决的能力。因为裁决和生成，不是先后发生的两件事。裁决本身就是生成。那个在混沌中独自辨认方向、在无路处亲自裁断路径的动作，不是通往作品的准备，它就是作品发生的那个不可代偿的发生学位置。

本文把这个位置命名为“决-生成”。

二、从一次崩塌往回追溯：裁决为什么就是生成

她后来告诉我，她曾经试着“戒掉”AI。她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一个月内，不用任何AI工具，完全用手画。她想看看，那个她隐隐感到已经丢失的东西，能不能自己找回来。

结果是她没撑过一周。

不是她意志不坚定，而是她发现自己面对一张空白画布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她已经习惯了AI给她抛出十几个方案——她只需要在这些方案中选一个“最有感觉的”，然后微调。现在方案没了，只剩下她和一张白画布。她忽然不知道自己要画什么，更不知道如果要画，第一笔该落在哪里。她盯着那张白画布整整一个下午，一笔没动。她说那个下午她第一次真正感到了恐惧——不是画不好的恐惧，而是一种更深的恐惧：她发现自己的内部什么都没有。

请注意这个描述。那个下午，她坐在画布前，脑海中闪过的不是“我画不好”，而是——她后来仔细回忆时告诉我的——一种极其具体的感觉。她说，她能感觉到她的“判断力”还在。她看着那张白画布，心里清楚如果现在有一张成品摆在她面前，她能立刻说出它好不好、好在哪里、该怎么改。但这个判断力像一个悬在半空的齿轮，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咬合。她需要的不是“判断一个已有的东西”，而是“在没有东西的地方踩出一个东西”——而那个踩出去的器官，不在那里。她说不出那个器官叫什么，但她准确地说出了它的位置：它不在脑子里，在手指尖上。不是在“想”的那个区域，而是在“做”的那个区域——更精确地说，是在“想”和“做”还没分家、还是一个动作的那个接缝处。她发现自己的这个接缝，是空的。

这不是一个修辞。这是一个精确的发生学陈述。它所揭示的是：在长期被外部代偿的过程中，她内部那一整套“在混沌中生成方向”的能力——不是具体的画画技巧，不是美术史知识，不是风格判断力——而是那个最底层的、在毫无外部坐标时仍然能够推动整个创作发生的能力，从未被激活过。这个能力的缺失有一个极其可辨识的特征：不是她做不出好东西，而是她做得出好东西但不知道为什么。好是别人告诉她的，也是她自己能判断出来的——但如果把别人拿走、把判断的标准也拿走、把一切外部的参照都撤到零，只剩下她和一个空白面，她不知道第一脚该踩在哪里。

这套能力是什么？本文认为，它不能被拆解为“辨认目标的能力”加上“裁决路径的能力”——这种拆解本身就是把裁决当成了生成的准备。它必须被理解为一个不可拆解的、裁决与生成同时发生在其中的统一的动作：决-生成。

2.1 裁决即生成：一个本体论判断，不是修辞

让我从两个方向来逼近这个统一的动作是什么。在此之前，我必须先回答一个根本的哲学性质疑：为什么不能说，方向以模糊的形态早已存在于潜意识中，裁决只是将它“发现”并“明确化”？这个质疑如果不是修辞，它就切中了“决-生成”作为一个本体论判断的生死线——因为如果裁决只是发现，那么裁决与生成的同一性就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先有模糊的生成、再有清晰的裁决”的时序关系，决-生成这个概念就塌了。

这里的要害在于：一个在裁决之后才首次成为“可被指认的方向”的东西，在裁决之前，不能被称为“以模糊形态存在”。因为“模糊形态”本身已经是一个方向——只不过它没有被精确化。但如果那个方向在裁决之前根本不可被指认——不仅对旁观者不可指认，对创作者本人也不可指认——那么说它“以模糊形态存在”就是一个伪陈述。它不是在模糊地存在，它是根本不在场。它的在场，是裁决的动作本身赋予它的。

这里需要引入一个更严格的论证框架来支撑这个判断。当代决策认知研究对“选项生成”（option generation）与“选项评估”（option evaluation）的区分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的分析资源。在经典的决策模型中，人们一度假设决策就是在给定的选项集合中选择最优项——但近二十年的研究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在许多真实世界的复杂决策中，选项本身并非给定的，而是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主动构造出来的（Klein, 1998; Gettys & Fisher, 1979）。这一研究传统揭示了一个关键的发生学层次：在选项被构造出来之前，它们不在场——不是以“模糊选项”的形态隐藏在某个地方等待被发现，而是根本不存在任何可被指认为“选项”的东西。所谓“构造选项”，就是在一个尚未被结构化的情境中，通过某种认知动作，首次将一种可能的行动方案生成为可被审视的“一个选项”。

这正是“裁决即生成”所要指认的结构。创作者面对白画布时的处境，不是一个“有多条模糊路径可选”的处境——那是选项充裕者的错觉。真正的混沌是：连“路径”这个范畴本身都不在场。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作“方向”的东西，也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作“方案”的东西。那个后来被他称为“方向”或“方案”的东西，是在他裁决的那一刻——在他对自己说“就是它”或他的手自己踩下那一笔的那一刻——首次被生成为可被指认的“一个方向”。裁决的动作不是在选项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让选项首次成为选项。这正是“生成”的含义：不是从无到有变出一个物质实体，而是从无序中切出一种可辨识的差异结构。而这个切出的动作，同时是裁决（因为它决定了哪一刀、切在哪里）和生成（因为切下去之前，那个差异结构不存在）。它们不是两件事，它们是同一件事的两个不可拆分的面——正如你无法把“握拳”拆成“手指弯曲”和“手掌收紧”两个独立动作。它们不是在时间上先后

继起的因果链，而是在逻辑上不可拆分的同一性：裁决的那个“是”字说出口的那一刻，被它所是的东西才第一次生成成为可被指认的“这个东西”。

吉布森（Gibson，1979）在视觉感知研究中提出的“感知即行动”论证，为这一判断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发生学参照。吉布森指出：有机体不是先感知到环境的客观属性、然后再决定如何对环境做出行动——感知本身就是一种主动提取信息以指导行动的过程。你看见一个物体的同时，你的身体已经在准备对它做些什么。感知和行动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的两个面。把这个论证挪移到创作领域中来：创作者不是先看清方向再走向它，而是在走向它的过程中看清它。而“走向它”的那个第一步——在外部坐标无法送达之处，他独自踩下去的那一脚——就是裁决。这个裁决的动作，不是对一个已有方向的辨认。它是对一个尚不存在、但通过踩下去这一脚而首次被生成出来的方向的裁决。裁决的那一刻，生成同时发生。

这一本体论判断同时也回应了一个更深的质疑：如果裁决之前方向真的完全不在场，那么裁决的依据是什么？裁决岂不成了纯粹的任意？这里的要害在于：裁决并非凭空做出，它依据的是创作者在漫长的场域浸泡中积累的全部经验、感知、情感与判断力的“混沌体”——但请注意，这个混沌体在裁决之前尚未被秩序化，它不具有“方向”的属性。它的存在形态是混沌，不是隐秩序。裁决的动作，就是从这个混沌体中切出一种秩序——这个秩序不是混沌体“本来就有的”，而是裁决的动作赋予了它。正如黏土在雕塑家动手之前不是“模糊的雕像”——它只是黏土。雕像的形态是在雕塑家每一次裁决“这里该挖掉、那里该保留”的动作中，首次被生成出来的。黏土提供了物质条件，但没有提供形式。同样，创作者的全部经验提供了裁决的“材料”，但没有提供“方向”。方向是裁决从这些材料中切出来的。

这就是“裁决即生成”的本体论含义。它不是程度问题，不是“裁决中包含了一些生成的成分”或者“生成中掺杂了一些裁决的因素”，而是发生在先的那一个不可拆分的动作，其中裁决和生成不是两个可以拆开的零部件，而是一个动作的同时两面。

2.2 决-生成的两个维度：方向和路径

确立了裁决即生成的本体论位置之后，我来从两个维度展开这个统一动作的具体运作方式。

先从一个看似悖谬的方向。任何一个有内在必然性的作品，它的起点都不是创作者事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然后再去找合适的形式把它“做出来”。恰恰相反，在真正的创作发生之初，创作者往往处于一种目标不明的混沌状态：他感到某种模糊的、不肯散去的冲动，但他根本说不清那是什么。这不是“大概有个方向但不确定”的状态——那是已经有方向、只是还需要精确化。混沌状态的特征恰恰是：连“方向”这个范畴本身都不存在。他知道自己想做一些东西，但他无法说清那个“东西”是什么——因为那个“东西”在被裁决之前，根本不曾作为一个可辨认的对象存在于他的意识或潜意识中。他必须独自浸泡在这种无坐标的混沌中，用自己的手一遍遍地试、用眼睛一遍遍地辨认，直到某个瞬间，他从一堆杂乱的尝试中忽然“认出”了某个东西——但更准确地说，不是“认出了”一个已经在那里的东西，而是他的裁决动作本身，在那个瞬间，把一个此前不存在的方向生成了出来。他对自己说：“就是它。”在这个时刻之前，没有人——包括他自己——知道他在找什么。在这个时刻之后，方向才第一次成为“一个方向”。

这就是决-生成在方向维度的运作方式。它不是“发现方向”，它是“生成方向”——而生成的动作与裁决的动作，是同一个动作。

再从另一个维度逼近——路径的维度。一旦方向被决-生成出来，创作者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如何从此刻的状态抵达那个方向。同样地，没有任何现成的地图。他掌握的全部技巧、熟悉的所有语汇，都是为别人走过的路准备的。他要走一条自己的路，就必须在这些人大道之外，用自己的手、自己的身体、自己每一次下笔时的判断，去“裁”出一条新路——这一步下去，可能对，可能错；可能五年后回头看是天才之笔，也可能五年后回头看是一段被浪费的弯路。但无论如何，这一步必须由他自己踩下去。同样地，路径在裁决之前不存在——不是有十条隐藏的路等他去发现其中“正确的”那一条，而是根本没有任何一条路，直到他踩下去的那一脚，才把那条路首次生成出来。他裁决“这条路是对的”的那一刻，这条路才被生成成为“一条路”。

现在，我可以把这个统一动作的发生学结构说清楚了。决-生成由三个不可拆分的要素构成：混沌（无外部选项、无可依凭的标准、方向与路径均不在场——不是“不确定”，而是“不在场”）；裁决-即-生成（在同一动作中踩出方向或切开路径——不是从A选B，而是让B首次成为可选的B）；独自承担后果（没有任何外部权威能在裁决那一刻告诉他“你对了”——他必须自己承担这个裁决的全部后果）。这三个要素不是三个步骤，而是一个动作的三个面。混沌是决-生成被逼出的条件；裁决-即-生成是决-生成的本体；独自承担后果是决-生成的伦理内核——它保证了裁决与生成的那个“同时”不被拆开。因为如果有任何一个外部权威可以在裁决的那一刻替他确认“你对了”，那么裁决与生成就被拆开了：裁决由外部权威完成，生成由创作者执行。那个“同时”就消失了。

2.3 决-生成与生成性磨难

那么，这个决-生成器官究竟需要什么东西来激活？它需要一个共同的基质——“生成性磨难”。

这里必须给出一个极其精确的定位，因为这个术语极易被误解。生成性磨难不是被折磨的痛苦，不是吃苦的浪漫化，更不是一种“磨难崇拜”——好像越苦越光荣。它是一个纯粹的、冷冰冰的发生学事实：决-生成这个动作，必须在一种没有任何外部选项、没有任何可依凭的标准、没有任何人能替你承担后果的状态下，被逼出来。磨难不是目的。磨难是那个逼着裁决与生成同时发生的唯一情境。

这里需要对“磨难”的操作性定义做出严格界定。生成性磨难的本质，不是“技术工具的缺场”，也不是“承受痛苦的主观体验”——那些都是它的可能表现形式，但不是它的发生学内核。它的内核是：裁决与生成的同时性不被第三者拆开。这个定义同时澄清了它不是什么：它不是对“艰苦条件”的怀旧，也不是对“传统创作方式”的偏好。它不附属任何特定的技术条件或创作形式。它只取决于一件事：在那个创作发生的临界点上，裁决的动作与生成的动作，是不是在同一个人的身体里、在同一次动作中发生的。

这一定义同时也为它与技术工具使用的关系划定了清晰边界。在完全无工具的极端条件下，裁决与生成的同时性是被匮乏逼出来的——你除了自己踩下去，没有别的选项。这是一种“结构性剥夺”——但剥夺的不是工具，剥夺的是“裁决与生成可以被拆成两个独立工序”的可能性。在有工具的条件下，生成性磨难仍然可能发生，只要工具的使用方式没有在裁决与生成之间插入一个第三者来完成其中任何一端。一个创作者与AI反复拉锯，每一次否定AI的方案之后都必须回到自己内心的混沌中去重新裁决方向，每一次踩下去都必须自己承担后果——这种高强度阻力同样构成生成性磨难，因

为它同样逼着裁决与生成在创作者身体里同时发生。生成性磨难的反面，从来不是“使用了工具”，而是“裁决与生成被拆成了两个由不同主体分别承担的工序”。

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的推论：生成性磨难不需要以“完全不使用工具”为前提，但它确实需要一个不可被绕过的最低条件——在创作的某个关节点上，外部代偿被撤回到裁决与生成那条纽带的下游，创作者必须在那个关节点上亲自完成裁决-即-生成。没有这个最低条件，决-生成器官就没有被逼出的土壤。这个最低条件可以被各种不同的技术配置所满足——从无工具的极端匮乏，到有工具但刻意保留裁决空白的高强度阻力——但它们共享同一个发生学结构：在那个临界点上，裁决与生成必须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次动作中完成。

一个帮助理解这个发生学结构的类比：你可以想象一个一生中从未在完全的黑暗中待过的人——他的眼睛的生理结构完全正常，但他永远不会拥有那种在漆黑中辨别微弱光亮的敏锐。那种敏锐不是“知识”，不是“技能”，是你必须真的在黑里待过，你的视网膜上的视杆细胞才会被逼着调到最灵敏的状态。决-生成器官，同样遵循这个逻辑。它不是教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是被一种特定的境遇逼出来的。而当代艺术创作危机的核心，正在于这个境遇——这个裁决与生成必须同时发生、由同一个人承担的暗夜——正在被一种新型的技术代偿系统性地撤除。

三、与深层理论传统的切分：决-生成不是什么

一个新的发生学判断，如果不能与它最相近的既有概念划清边界，就只是一个漂亮的新词。而且，这种划界不能只是说“我比它更原始”——那是程度差别，不足以确立质的飞跃。它必须证明：既有概念各自在某个关键点上停滞了，而它们的停滞点共同指向了同一个被遮蔽的辨别面；决-生成切入的，正是那个被共同遮蔽的结构。这一节，我将“决-生成”与三个在既有文献中最有解释力的深层理论传统逐一切分，并在认知决策理论的帮助下，精确展示这道辨别线的位置。

3.1 与布迪厄“实践感”的切分

布迪厄（Bourdieu, 1980）的“实践感”精确地描述了行动者在不确定情境中“即兴发挥”的能力——它不是遵循规则，而是在实践中“生成”规则。拳击手在擂台上无法停下来计算对手的下一拳会从哪里来，他必须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做出判断并出拳——这个判断不是对已有选项的选择，是在行动中裁决并在同一刻生成行动本身。从表面看，这与决-生成高度同构：两者都发生在不确定的情境中，都不遵循预定规则，都是裁决与行动的同时发生。

但这里有一条看似细微、却极为关键的辨别线。实践感所面对的情境——无论多么不确定——在裁决发生之前已经具有了某种结构。对手的姿势、重心的偏移、上一个动作的惯性、整个竞技场的规则体系，这些都构成一个虽然不是完全确定、但绝非绝对混沌的情境连续性。更关键的是，这个情境结构中已经内嵌了一个差异系统：什么算“击中”、什么算“落空”、什么算“得分”——这些让裁决能够被判断为“对”或“错”的标准，不是拳击手在出拳的那一刻生成的。它们是由整个竞技场的规则体系、训练传统和身体技术共同建构的，拳击手进入这个场域时，这个差异系统已经在场。他的裁决-生成——那一拳的选择与执行——发生在坐标系内部：他是在一个已经存在的差异系统里即兴生成一个具体动作。

决-生成所面对的，是比这更原始的一个时刻：不是在已有差异系统的场域中即兴生成动作，而是在差异系统本身尚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裁决-即-生成的动作，首次切出那个让“对”与“错”能够被判断的初始差异结构。

回到那位年轻创作者的困境，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个区别。她面对白画布时的恐惧，不是因为现实条件（画布、颜料）缺场——那些都在。她失去的，是整个理念界中那个原本可以使她在运笔之际分辨“这笔对了”与“这笔错了”的差异结构本身。她缺的不是在已有坐标系中即兴发挥的能力——那是实践感能解决的问题。她缺的是那个坐标系本身。而这个坐标系，在白画布面前，只能由她自己裁决-即-生成出来。没有任何外部已有的标准能替她做这件事。

这就是“生成坐标系”与“在坐标系内生成动作”之间的质的差别。它不是“情境更不确定”“选项更模糊”的程度问题——它是在裁决发生之前，连那个让“选项”成为可被指认的“选项”、让“对错”成为可被判断的“对错”的差异结构本身，都不在场。前者生成的是一个动作，后者生成的是让动作能够被判断为“对”或“错”的整个差异空间。

当代决策认知研究为这道辨别线提供了独立的、来自另一个学科的证据。Klein（1998）在自然决策理论中提出的“识别启动决策”（recognition-primed decision）模型，描述的是专家在时间压力下如何快速识别情境类型并调取相应的行动模式——这正是实践感的认知机制：专家的身体已经通过长期训练，将大量的情境-行动配对沉淀为可被快速识别的模式。但Klein同时指出，这种机制依赖一个前提：情境中的关键特征必须足够显著，能够触发识别。当情境本身是全新的——当没有任何可被识别的情境类型与当前处境匹配——识别启动机制就失灵了。决-生成所面对的，正是这个“失灵”的时刻：不是情境类型的模糊需要更努力地识别，而是连情境类型本身都不存在，必须由裁决首次生成。这是一个被自然决策理论识别出来、但未专门命名的极限状态——而决-生成，要命名的正是这个状态。

此外，布迪厄的理论图景中还有一个决-生成所不共享的预设。在实践感的运作中，裁决的“对”与“错”最终由场域的集体实践来确认——你出拳对了，因为你击中了对手；你出拳错了，因为你被对手击中了。这个确认来自外部。而决-生成中裁决的“对”与“错”，在裁决发生的那一刻没有任何外部标准能告诉你——你必须自己承担这个裁决的全部后果。这个独自承担后果的伦理维度，是决-生成与实践感之间的另一道辨别线。实践感描述的是社会性协商中的即兴；决-生成描述的是独自面对虚无时的生成。

3.2 与杜威“做即知”的切分

杜威（Dewey, 1934）在《艺术即经验》中对创作过程的论述，比布迪厄更接近于决-生成的核心洞见。杜威拒绝了“先有观念、后有执行”的二元论，主张在真正的艺术创作中，做与知是一个统一的、不可拆解的过程——画家不是在画之前就知道自己要画什么，而是在画的过程中逐步知道自己在画什么；每一笔下去，都既是做（生成）又是知（裁决）。这个判断在表面上看，与本文“裁决即生成”的判断几乎完全一致。

但这里的辨别线同样不容模糊。杜威讨论的“做即知”，其运作模式是一个连续体中的渐进明晰化——每一次做都产生新的知，新的知又引导下一轮做，如此循环推进。在这个模式中，裁决与生成的同一性分布在过程的每一个节点上：每一笔都是一次微型裁决，每一次微型裁决都让作品的方向比

上一刻更清晰。这种“做即知”的结构，适用于创作过程的主干——当作品的基本方向已经被确立之后，创作者的裁决-生成在每一次下笔中精细地调控着作品走向最终形态。

但决-生成所要指认的，不是这个渐进明晰化的过程本身，而是那个让过程能够首次启动的动作。在杜威的模式中，“做即知”的循环一旦启动，它可以逐步自我校准、自我推进。但“做即知”的循环本身是怎么被启动的？在画家落下第一笔之前，他还什么都没有“做”，所以也还没有任何“知”可以被做产生出来。那个从零到一的断裂点上——没有任何渐进可言，没有任何循环可依赖，没有任何之前的“做”能为此刻的裁决提供依据——创作者必须做出一个裁决，这个裁决同时生成第一笔、也生成那个让后续一切“做即知”循环得以运转的初始方向。而且，这个初始方向一旦生成，它反过来限定了后续所有“做即知”循环的可能范围——你选择从一个角度切入，就意味着放弃了从其他所有角度切入的可能。这个从零到一的裁决的赌注，不同于“做即知”循环中的任何一次渐进裁决的赌注：渐进裁决如果错了，后续的“做即知”循环可以修正它；从零到一的裁决如果错了，整个作品的基础就建立在错误的方向上——或者作品根本不会发生。

因此，裁决与生成的同一性，在杜威那里是过程性的、弥散的——它分布在一百次微型裁决-生成中；在决-生成这里，它是临界性的、集中在一次不可撤回的跳跃中发生的——它是在过程尚不存在时，让过程得以首次发生的那个原初裁决-即-生成。两者不是同一种同一性在不同阶段的重复，而是两种结构不同的同一性。杜威的“做即知”描述的是从一到一百的过程；决-生成描述的是从零到一的断裂。两者的差别，不是“早期”与“晚期”的量的差别，而是发生学层次上的质的差别：前者在已有结构的基础上渐进，后者生成那个基础结构本身。

3.3 与梅洛-庞蒂“身体图式”的切分

梅洛-庞蒂（Merleau-Ponty, 1945）的身体现象学提供了第三种与决-生成高度相近的理论视域。他的“身体图式”描述的正是身体在知觉场中“即兴裁决-生成”情境的能力——一个画家在面对模特时，他的手不是在执行大脑的命令，而是身体本身已经理解了空间、光线、体积的关系，并在运笔的过程中裁决-生成了线条的走向。在这个描述中，裁决与生成的同一性被安放在了身体层面：不是“我思”在裁决、“我在”在生成，而是“我能”——身体的前反思能力——将裁决与生成统一在同一个动作中。

但这里的辨别线在于：梅洛-庞蒂的身体图式，尽管强调了身体的即兴能力，但它所描述的那种即兴，发生在身体已经通过长期的知觉-运动经验习得了某种“前反思的熟知”之后。画家的手之所以能在画布上裁决-生成出准确的线条，是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在成百上千次面对模特、面对画布、面对空间关系的经验中，沉淀出了一种身体性的“知”——这种知不是概念性的，而是身体性的，但它仍然是一种知，一种已经习得、已经沉淀、已经熟练的图式。身体图式的运作依赖这一前反思的熟知：它让你在熟悉的领域里如鱼得水。

而决-生成要指认的，恰恰是那个“连身体的熟知都不在场”的时刻。那位年轻创作者面对白画布的恐惧，不是因为她的身体图式没有被训练过——她学了十年油画，她的手应该已经沉淀了大量的视觉-运动图式。但她仍然无法落下第一笔，因为那些图式都是在已有的、由他人作品的坐标所建构的场域中习得的；当这个场域被撤走，只剩下她和一张空白画布时，她的身体图式找不到任何可以咬合的熟悉结构。决-生成对付的，恰恰是身体图式的极限——当熟知耗尽、当图式失灵、当身体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时候，仍然能够踩出一个新的方向、由此生成一个新的图式的那个更原始的器官。

换言之，身体图式是决-生成的历史沉淀物；决-生成是身体图式的生成器。前者让你在熟知的领域里畅通无阻，后者让你在陌生的荒原上踩出第一条路。两者的关系不是并存，而是生成关系：决-生成是“图式的发生”，身体图式是“发生的图式化”。这就如同语法与言语的关系——语法是已经沉淀的规则，言语是每一次对规则的活的使用；但在语言发生的那个原初时刻，语法本身也是言语的沉淀。决-生成，就是那个在身体图式尚未沉淀、尚无任何熟悉结构可供调用的临界点上，仍然能够动作的“原初言语”。

3.4 “决-生成”切开了什么

将三场切分收拢起来，可以看清决-生成切入了一个什么样的辨别面。布迪厄的实践感、杜威的做即知、梅洛-庞蒂的身体图式——这三个理论传统，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级上触及了裁决与生成的交织性，但它们的共同边界在此处：它们所描述的裁决-生成，都发生在某种已经存在的结构、过程连续性或身体熟知的基础之上。实践感发生在已建构的场域中；做即知发生在已启动的过程中；身体图式发生在已习得的熟知中。它们都没有专门处理那个让它们所依赖的那个“已存在的结构”本身得以首次发生的动作。

这不是“更原始一点”的程度差别，而是发生学层次上的质的飞跃：一个生成的是坐标系，另一个在坐标系内生成动作；一个是从零到一的断裂，另一个是从一到一百的渐进；一个是图式的生成器，另一个是图式的运用者。之所以说这是质的飞跃，而不是量的差别，是因为两者所处理的对象的性质根本不同。实践感、做即知、身体图式处理的都是“已经有差异结构在场”的情境中的动作；决-生成处理的是“差异结构本身不在场”的情境中的动作——而后一种情境中，裁决所面临的存在论赌注、不可撤回性、以及独自承担后果的伦理分量，与前者有质的区别。在已有差异系统的情境中，裁决的后果可以被差异系统吸收——你出了一拳，被对手格挡了，下一拳可以调整。在差异系统不在场的情境中，裁决本身就是那个建立差异系统的动作——你的第一笔错了，有可能接下来的一百笔都建立在这个错误的第一笔所建立的坐标系上，再也没有机会在同一个作品里重建坐标系。

这道辨别线，是这三个理论传统各自独立而又各自未能单独显影的盲区。而“决-生成”这个命名，就是要让这个盲区第一次成为可被指认、可被讨论、可被追操作的理论对象。

四、生成式AI：第一台摸到裁决上游的代偿机器

前面三节确立了一个发生学判断：决-生成是一个不可拆开的统一动作，裁决与生成的同一性构成了创作发生的那个不可代偿的位置。现在，这个判断可以把一个被争论了很久的问题说清楚了：生成式AI究竟与历史上一切创作工具有什么不同？

这一问题之所以被争论这么久而始终没有定论，是因为争论的双方共享了一个未被检视的预设：工具的功能是代偿，区别只在于代偿的程度。如果这个预设是对的，那么生成式AI确实只是“代偿得更多”的工具，与以往的一切工具在谱系上是连续的。但本文的判断指出了这个预设的盲区：工具代偿的从来不只是“程度”，更是“位置”。当工具站在裁决的下游——代偿执行——它不触碰裁决与生成的同一性。当工具摸到了裁决的上游——直接在那片尚未发生裁决的混沌中吐出已完成裁决的方案——它就不再是代偿程度的问题，而是代偿位置的位移。它开始拆开裁决与生成。

4.1 旧工具：站在裁决的下游

透视法、摄影术、留声机、数字剪辑——这些曾在各自时代被惊呼为“艺术终结者”的工具，全部遵循同一条边界：它们所代偿的，是发生在决-生成之后的那些工序。透视法让画家更容易在平面上经营空间幻觉，但它从未替画家决定哪条线该画在哪里——裁决与生成的同一性仍然在画家的身体里发生，透视法只是让这个已经被裁决-生成出来的视觉意图执行得更精确。摄影术让影像的捕捉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但摄影师仍然必须自己长年在镜头后面培养那种“在什么时候按下快门”的决-生成——没有任何工具能替他裁决-生成那个瞬间。数字剪辑让影像拼接无比灵活，但导演仍然必须自己在剪辑台上完成那个不可撤回的决-生成——什么留下、什么剪掉——并为之承担全部责任。

这些工具的共性是：它们扩大的是裁决的下游后果——让同一个裁决可以被更高效、更精确地执行，或者让裁决的后果可以被更灵活地修改——但它们从未摸到裁决本身的位置。裁决与生成之间的那条纽带在这些工具的运作中始终完好无损：创作者仍然必须自己浸泡在混沌中，自己裁决-生成方向和路径，自己承担裁决的全部后果。工具只是帮他更好地执行那个已经被裁决-生成出来的东西。因此，这些工具的出现，从未系统性地拆解过决-生成的发生条件——它们确实改变了创作的形态、挑战了某些传统的技艺标准、引发了关于“什么是艺术”的激烈争辩，但它们从未导致一种结构性的现象：大批创作者的决-生成器官从未被激活。

4.2 新工具：站在裁决的上游

生成式AI的断裂性就在于它越过了一条从前没有任何工具越过的界线。它不是等待裁决完成之后再高效执行，而是直接在裁决尚未发生的混沌里吐出一堆已经完成了裁决的方案。这个断裂需要从技术机制层面得到更具体的解释。

当代生成式AI——特别是基于扩散模型的图像生成系统——的核心运作逻辑可以这样理解：模型在训练阶段通过海量图像-文本配对数据，学习到“什么样的视觉特征与什么样的语义描述相关联”的统计规律。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它“学会了画画”，而在于它学会了一种对视觉风格的隐式编码——它可以将“印象派”或“赛博朋克”这样的风格标签，转化为一组高维空间中的数学权重，然后通过去噪过程，从随机噪声中逐步生成符合这些权重的图像。扩散模型的每一步去噪，从机器学习的角度看是“预测并去除噪声”，但从发生学角度来看，恰是一个持续的裁决-生成过程：模型在每一个时间步上都在裁决-生成“这个像素相对于目标分布应该向哪个方向调整”。这种裁决-生成内嵌在模型的推理过程中——它裁决和生成的不是一笔一划，而是整个图像的概率分布结构。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创作者向AI输入一个提示词时，AI向他返回的不是一个“执行了一半的草图”等待他来裁决接下来的方向——那是旧工具的模式。AI返回的是一堆已经完成了的、每一个像素都已经被裁决好的成品。这些成品中内嵌的裁决，不是创作者的裁决，而是模型在训练数据中学习到的“平均裁决”——是在数百万张已有作品中沉淀下来的、被反复验证过的“好构图”“好色彩”“好风格”的统计模式。创作者面对的不再是一张需要他自己裁决-生成的白画布，而是二十个已经由“平均裁决”完成了的方案。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技术细节可以进一步加深理解。扩散模型在推理时通常需要20到50个去噪步骤，每一步都在“裁决-生成”图像应该向哪个方向演化——但这个过程对于用户来说是完全不可见的，被封装在一个黑箱里。用户看到的是输入提示词之后几秒钟就出现的完整结果。这就造成了一个

关键的发生学后果：模型内部的裁决-生成过程与用户的裁决过程，在时间和因果上被完全隔离开了。用户看到成品时，模型内部的裁决-生成已经结束；用户能做的只是对这个已经完成了裁决的成品做出“喜欢”或“不喜欢”的判断——也就是挑选。这就是为什么挑选永远不等于裁决：裁决是生成过程中的构成性动作，挑选是生成过程结束后的外部评估动作。

4.3 拆开裁决与生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发生学事件

在既往的一切创作工具史上，裁决与生成之间的那条纽带从未被触碰过。创作者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使用工具来辅助执行，但裁决的位置始终稳稳地留在创作者的身体里。生成式AI第一次摸到了这个位置——不是“占据”它（那是文化工业的压制逻辑），而是“拆开”它：把裁决缩减为挑选，把生成外包给算法，让裁决与生成从一个人身体里的同一个动作，变成两个可以由不同主体在不同时间独立完成的工序。

这个拆开的深远后果，不在能力层面，而在发生条件层面。旧工具的代偿，让你的手变得不那么灵巧，或者让你的某些具体技能变得生疏——但你仍然在裁决，仍然在生成，仍然在每一次裁决-生成中激活那个器官。而新工具的拆开，让你从未被逼到那个必须裁决-生成的临界点上——你的判断力还在，你的鉴赏力还在，你的生产效率甚至可能比那些走过决-生成之路的创作者更高，但你的裁决与生成从未在你的身体里汇合为同一个动作。你的决-生成器官从未被激活。这就是那位年轻创作者困境的发生学本质：不是她的创造力退化了，不是她被文化工业压制了，不是她太依赖工具——而是裁决与生成被拆开之后，那个让她成为创作者的发生条件，从未被满足过。

当代技术哲学为理解这一拆开的发生学意义提供了重要的参照。这一传统中有一个深刻洞见：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工具——它在代偿人类某一能力的同时，也在重塑人类的其他能力乃至人类对自身的理解。正如书写技术外化了记忆，从而改变了人类组织知识的认知结构；生成式AI外化了裁决-即-生成，从而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成为一个创作者”所需的发生条件。本文的判断嵌在这一技术哲学脉络中，但推进了一步：裁决-即-生成这一结构的不可代偿性，不是一种文化偏好或怀旧情绪，而是一个发生学边界——越过这个边界的代偿，触碰的不是作品的品质，而是创作者能够在混沌中裁决-即-生成出初始差异结构的那种能力的发生条件本身。

五、与“人机共生创作观”的正面交锋

一个严肃的判断必须去正面迎击那个最能威胁到它的对手。对于决-生成结构不可代偿性的判断而言，这个对手不是“AI取代论”的恐慌者——这甚至不是敌人，而是难友。真正的对手是一批拥有更强论证力量的思想者，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裁决与生成被拆开”的危机，人类与AI的共创恰恰是一种全新的、更高阶的创作形态。在这一视野中，创作者不是被AI拆分其创造器官的被动受害者，而是与AI形成共生关系的新物种——正如画家与透视法、音乐家与记谱法、建筑师与参数化设计软件之间的关系一样，AI只是人类创作工具箱的又一次历史演进。你认为这一次不同？每一次都有人这么说，每一次都错了。

这一反驳具有真正的方法论分量，因为它精准地打在了一个关键的历史事实上：在艺术史上，每一次新工具的引入，都曾被同时代人惊呼为“艺术的终结”。每一次，这些预言都落空了，因为旧的

工具和旧的形式并没有被杀死，而是新的可能性在新的工具上长了出来。人机共生论者有充分的理由反问：你凭什么说这一次不同？

我的回应分为两层。

5.1 历史类比的有效性边界

第一层是对历史类比的精确拆解。那些曾经引发“艺术终结”恐慌的工具——它们所代偿的，全部是执行的工序。这是第四节已经充分论证的判断，这里不再重复，只点出与人机共生论直接相关的结论：共生论者所援引的那些历史案例全部属于“工具站在裁决下游”的范畴，因此它们不能构成“这一次也会一样”的有效类比。因为这一次的工具第一次站到了裁决的上游——它不是在裁决完成后高效执行，而是在裁决尚未发生时直接产出已完成裁决的方案。这个质的差别意味着：历史的类比在代偿位置的维度上失效了。要反驳“这一次不同”，共生论者必须论证生成式AI与透视法、摄影术在代偿位置上没有质的差异——即，必须论证生成式AI没有摸到裁决与生成之间的那条纽带，或者论证那条纽带根本不存在。本文第四节已经完成了前一论证；如果共生论者要反驳，他们必须攻击那个论证，而不是用一个质差被抹平了的历史类比来偷换。

5.2 理想拉锯战：决-生成的新形态，而非拆解

第二层回应更加根本，也更具建设性。人机共生创作观所设想的那种理想场景——一个创作者与AI在长期协作中反复拉扯、反复否定、反复确认那个“不来自AI而来自我自己”的声音，进而在这种拉锯战中形成一种新的创作驱动力——这一幕，如果在真实的创作现场发生，恰恰不是对决-生成不可代偿性的证伪，反而是对其核心逻辑的印证。

关键在于怎样分析这种拉锯战中裁决与生成的关系。一个尖锐的反驳是：如果AI生成的选项本身构成了强大的、不易摆脱的“情境定义”，那么拉锯战是否可能仍是一种“在更高阶框架内的挑选”？例如，创作者的反复否定，是否可能仍是在AI提供的“选项域”和“风格参数”内部进行博弈，而非真正从零裁决-生成？如果这个反驳成立，那么所谓的人机共生不过是一种更精致的拆开——创作者以为自己正在与AI拉锯，实则他的每一次否定和确认都是在AI预设的选项域内打转，他从未真正触及裁决与生成的那个同一性。

这个反驳必须被认真对待，但它自身的逻辑有一个裂纹。裂纹在于：它预设了“AI的选项域”是一个封闭的、不可被裁决自身突破的边界。但如果一个创作者在与AI的拉锯中，真的用自己的裁决——那个在做选择时必须独自承担全部后果、并且找不到任何外部标准告诉他“这一选一定对”的动作——踩出了一条不在AI选项域内的路，那么这个裁决本身已经突破了选项域的边界。它不是在选项域内挑选，它是用自己的裁决扩展了选项域——或者说，裁决-生成了一个新的选项域。

但这里必须引入一个审慎的条件分析。这种理想拉锯战的发生，至少需要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第一，创作者必须已经具备足够强的决-生成能力（或至少该器官曾被激活过），以至于他能够在AI的选项域面前保持“这不是我要的”的否定性判断——而不仅仅是“这个比那个更好”的比较性挑选；第二，创作过程必须被刻意组织成一种保留裁决空白的结构——例如，创作者在发出提示词之前先自己裁决方向，或者在AI返回方案之后刻意回到自己内心的混沌中重新裁决，而不是连续接受AI的选项流。如果这两个条件不同时具备，“拉锯战”确实极有可能滑向更复杂的挑选。

这里需要诚实面对一个现实困境：在大多数实际创作场景中，这两个条件恰恰是稀缺的。对于像那位年轻创作者一样的学习者，他们的决-生成器官从未被激活过，因此当他们面对AI的选项域时，他们缺乏“这不是我要的”那种否定性裁决的能力——他们只能在选项之间比较、挑选、偏好。而那些已经具备决-生成能力的成熟创作者，他们的拉锯战能否持续为生成性磨难，取决于他们是否有意识地保留裁决空白——但在高强度的生产压力下，这种刻意的保留往往是最先被牺牲的。因此，人机共生作为一种理想模式，在理论上不违反决-生成不可代偿性的判断，但在实践中，它的大规模实现面临着结构性障碍。这不是一个理论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争论，而是一个“在何种条件下可能”的分析——而这恰恰是决-生成框架能够提供、而共生论未能提供的。

因此，本文的立场不是“AI必须被抵制”，不是“旧形式的磨难神圣不可侵犯”。本文的立场是：无论技术如何变迁，决-生成——那个“裁决与生成在同一个动作中发生”的结构——是不可被拆开的。如果创作者在与AI的协作中仍然找到了某种方式，让裁决与生成在自己的身体里被逼着同时发生——如果在那种拉锯战中他真的自己踩了下去并为之承担了全部后果——那么他的决-生成器官就被激活了，无论他用的是最先进的AI还是最古老的画笔。但如果他从头到尾只是挑选——如果裁决与生成从未在他的身体里汇合成同一个动作——那么那个器官就从未被激活。人机共生创作观与决-生成不可代偿性的判断并不必然冲突：前者描述了一种理想的可能性，后者诊断了一种正在大规模发生的现实状况。两者真正的分水岭，不在于“用不用AI”，而在于“裁决与生成有没有在这个人的身体里同时发生过”。

六、跨学科的印证：当同一个结构在别处被认出

如果一个判断只在艺术领域内有效，那么它可能只是一个描述特定场域现象的局部洞察。如果在多个相互独立的领域中，都各自浮现出一组结构上与“裁决与生成被拆开”高度同构的机制，那就意味着这个判断可能触及了一个比艺术更普遍、更深层的结构模式。本节将从教育学和治理术两个领域展开具体分析——不是作为将“决-生成”当作现成标签贴上去的演绎，而是在每一个领域内，从该领域自身的矛盾和发生学条件出发，追问那个与艺术领域同构的结构是如何在那个领域自身的土壤里、由该领域自身的矛盾逼出来的。

6.1 教育学：一个被托管了方向的发生学困境

在教育领域，有一个被反复讨论但很少被用发生学眼光审视的现象——不是“学生缺乏动力”，也不是“教育方法不当”，而是一种更隐蔽的机制：教育系统出于最真诚的善意，替学生走完了学习中那一段最难也最根本的路——不是知识传授的路，而是方向发生的路。

一个重点高中学生的经历可以展示这个机制如何运作。这个学生在中学阶段是典型的“优等生”——每一门课都有明确的目标，每一个目标都有清晰的路径，每一条路径都有精确的反馈。他很少感到“迷茫”，因为他不需要——父母和老师已经替他完成了所有的方向裁决：为什么要学数学？因为高考要考、因为竞赛能加分、因为好大学的好专业看重数学成绩。他不需要自己浸泡在“我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的混沌中，去独自裁决-生成一个属于自己的方向。别人已经替他裁决好了方向，他只需要执行。

这个模式在中学阶段运行得天衣无缝。他考入了顶尖大学的计算机系。然后他崩溃了。崩溃不是因为大学课程太难——他在学业上仍然可以应付。崩溃来自一个他从未被迫面对的问题：没有人再告诉他“为什么要学这个”。父母不再能替他裁决方向了，因为计算机科学的细分领域已完全超出他们的认知；老师不再能替他裁决方向了，因为大学的逻辑是“你自己选、你自己担”；同学也不能替他裁决方向了，因为他们各自在走各自的路。他忽然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混沌中：四周全是可能的方向——人工智能、系统架构、学术研究、产业开发——但没有任何一个方向是别人替他裁决好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外部标准能告诉他“选这个一定对”。他第一次必须在混沌中自己裁决-生成一个方向——然后他发现，那个让他能够做出这种裁决的器官，不在他身体里。

他不是没有能力。他的编程能力在系里排前列。他也不是没有兴趣——他对很多领域都“感兴趣”，但这是一种被动的“感兴趣”，一种“这个东西看起来不错”的挑选式偏好，而不是一种“我必须在没有路的地方踩出一条路”的裁决式投入。他可以对着课程列表挑出几门“看起来有意思”的课，但他无法在夜深人静时对自己说：“就是它——就算没人理解、就算可能失败、就算五年后回头看是弯路，我也要踩下去。”那个做出这种裁决的器官，从未被激活过。因为激活它的唯一条件——被扔进一个没有外部坐标的混沌里，亲自裁决-生成，并自己承担全部后果——在他整个受教育的过程中，从未被满足过。

这个案例揭示的发生学结构值得仔细拆解。中学教育的“善意”，在发生学上表现为一种系统性的裁决前置——学校、家长、考试体系联合起来，在学生还不具备裁决能力（也不需要裁决能力）的阶段，提前替他完成了所有关键的方向裁决。这种裁决前置在短期内带来了“高效”——学生不花时间在“迷茫”上，直奔目标，产出可量化的学习成果，所有人都满意。但这里付出的代价被整个系统忽视了：裁决前置在为学生省去生成性磨难的同时，也系统性地撤除了激活决-生成器官的唯一土壤。学生在长达十二年的基础教育中，从未被放置到一个必须自己裁决-生成方向的境遇里——他们只是在不同科目、不同难度、不同阶段上，执行别人已经裁决好的路径。等到大学阶段——那个被整个教育叙事描述为“你们终于自由了”的时刻——他们被释放进一个需要自己裁决方向的场域中，却发现自己内部那个裁决方向的器官，从来没有发育过。

这里尤其需要注意发生学分析对常见误读的纠正。有人将此诊断为“应试教育的恶果”“学生缺乏批判性思维”——这些是发现学的诊断标签。它们将问题归咎于“某种教育模式是坏的”，却不去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发生学机制，使得整个教育系统——无论它如何改革、如何提倡“素质教育”“核心素养”——都在持续地制造这个困境？回答是：裁决前置。只要教育系统继续替学生完成方向裁决，那么无论它在执行层面多么高效、多么“以学生为中心”，它都在拆开裁决与生成。裁决由系统完成，生成由系统提供路径，学生只剩下执行。而学生从未在自己身体里激活过那个“为自己裁决-生成方向”的器官。一旦外部托管撤除，他们坠入的虚空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是因为那个让主体在“没有方向的地方自己生出方向”的器官，从未被逼出来。

6.2 治理术：以保护为名的裁决代劳

在治理术领域，一个被反复批判但很少用发生学眼光审视的进程，是以保护为名的裁决代劳。1990年代，某个经历剧烈经济转型的社会中，大量原国有企业的劳动者失去了原有的制度庇护，被抛入一个他们完全不熟悉的、没有标准化路径的市场环境中。在此之前，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从进厂到退休——都是由体系替他们裁决好的：进哪个厂、做什么工种、拿多少工资、住什么房子、孩子

上什么学校、退休后怎么养老——所有这些方向性的裁决，都不需要他们自己做。他们只需要执行——在生产线上完成分配的任务，然后领取工资。裁决与生成被体系拆开：裁决由体系完成，路径由体系提供，劳动者执行。

当这个体系在几年内迅速瓦解时，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面对的处境在结构上与那个学生极其相似：他们被扔进了一个没有任何外部坐标的混沌中，必须自己裁决-生成生存的方向和路径——要不要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去哪里做？怎么做？——而那个让他们能够自己裁决-生成的器官，在他们几十年的体系化生活中从未被激活过。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经历初始的震荡之后，激活了这个器官；但更多人退出了一场他们无法独自裁决-生成路径的竞赛。

这里需要格外谨慎，避免将发生学分析简化为道德评价。说“体系以保护之名拆开了裁决与生成”，不是在指责体系“邪恶”或“不应当保护”——体系对劳动者的保护曾经是真实的、必要的、值得捍卫的。发生学分析追究的从来不是“谁的错”，而是“什么样的机制在运作，以及这机制有什么发生学后果”。体系出于善意替劳动者完成了裁决，这个动作本身同时实现了两件事：它保护了他们免于裁决失败的后果；它也使他们从未被放置到那个必须自己裁决-生成的境遇中去。这两件事不是对立的——它们是同一个动作的两个不可分的面。保护的代价，不是一种经济成本，而是一种发生学成本：决-生成器官的休眠。

这个分析可以进一步推及更微观的层面。在许多福利制度、组织管理、家庭教养中，都复现着同一种机制：被保护者被“善意”地免除了裁决的重负，同时也被隐秘地剥夺了激活决-生成器官的唯一条件。这不是在批判保护——保护在很多情境下是正当的、必要的。它要指出的是：保护如果摸到了裁决与生成之间的那条纽带——如果它开始替被保护者完成那个本该由他自己完成的裁决-即-生成的动作——那么它在保护的同时，也在拆解被保护者成为能够自我裁决、自我生成的主体的发生条件。这是一种非恶意的、以善意和效率为面孔的拆解。而它的隐蔽性，恰恰在于它看起来不像拆解——它在帮助、在保护、在使一切变得更容易。一个被保护得很好的人，可能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某个器官从未被激活过——直到保护撤离的那一刻。

6.3 同构结构的发生学共性

教育学中的裁决前置、治理术中的保护性裁决代劳——这两个现象彼此独立，各有自身的历史脉络和制度逻辑。它们不是“艺术领域判断的简单推衍”，而是在各自领域内部，被各自的结构矛盾逼出来的同构形态。这种独立性恰恰意味着，决-生成结构的不可代偿性可能不只是艺术领域的局部现象，而是指向了某种在当代社会多个领域中各自浮现的、以善意和效率为面孔的、系统性拆解“裁决与生成同时发生”之结构的进程。本文提供的不是对这些领域的盖棺定论，而是一个有待在每一个具体场域中分别检验的发生学假说：在任何需要主体亲自将裁决与生成汇合为同一个动作才能激活其核心能力的领域，善意而高效的外部代偿——如果它摸到了裁决与生成之间的那条纽带——都可能制造出结构上同构的“拆解”效果。

七、结论及证伪条件

本文的核心任务到此可以宣告完成。我们从一位年轻创作者面对白画布的恐惧出发，追问了当代艺术困境中那个比“AI取代人”更深也更隐蔽的结构——裁决与生成被拆开。我们指认了，在真正的

艺术创作中，裁决不是生成的准备或后续，裁决本身就是生成。那个在混沌中独自辨认方向、在无路处亲自裁断路径的动作，不是通往作品的一条路，它就是作品得以发生的那个不可代偿的发生学位置——“决-生成”。我们将这一判断置于布迪厄的实践感、杜威的做即知、梅洛-庞蒂的身体图式这三大深层理论传统的严格检验之下，引入决策认知研究的技术资源，论证了“决-生成”切入了一个这些既有概念未能单独显影的辨别面：不是在有结构的场域中即兴（那是实践感），不是在已启动的过程中渐进（那是做即知），不是在已习得的熟知中运用（那是身体图式），而是在混沌中首次裁决-生成出那个让场域、过程、熟知本身得以发生的初始差异结构。

我们论证了生成式AI区别于历史上一切创作工具的特异性：它是第一台摸到了裁决与生成之间那条纽带的代偿机器，通过扩散模型等将裁决内嵌于生成过程并对外封装为成品方案的技术机制，把裁决缩减为挑选、把生成外包给算法，拆开了那个从前从未被拆开的结构。我们正面回应了“人机共生创作观”的挑战，辨析了在何种条件下理想化的拉锯战可能成为决-生成以新形态发生的现场，也诚实指出了这种条件在大规模实践中的稀缺性。我们在教育学和治理术两个独立领域中，从各自领域自身的矛盾出发，认出了同一个结构模式的复现——不是作为现成概念的搬运，而是从每个领域内部的发生学追问中逼出同构形态。

最后，我们必须面对本文的理论自身的两个限定。

其一，本文提出的是一个发生学判断，不是一个工具批判。本文并不主张“AI对创造力有害”或“创作者不应该使用AI”。本文论证的是：裁决与生成的同一性是不可拆开的；如果技术代偿摸到了这个同一性，它不仅代偿了执行，还拆开了裁决与生成发生同一次动作的条件。这个判断对不同创作领域、不同创作个体、不同使用方式可能意味着截然不同的实践后果——本文只为这个判断提供理论根基，并不为所有处境制定统一的实践药方。

其二，本文判断的使用者必须警惕一种危险：这篇论文自己，也可能成为“拆开裁决与生成”的工具。一个熟悉这个判断的人可以极快地面对任何现象做出一个“漂亮”的诊断——“这是裁决与生成被拆开了”——然后在一篇篇看似深刻的文章里高效产出，却从未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案例里、一个真实的创作者面前，真正把自己浸泡进那个人面临的混沌中去，独自完成属于那个独一无二案例的决-生成。如果“决-生成”这个命名被当作一个现成的、锋利的诊断标签来使用，那么它自己就在复制它所诊断的那种机制：把裁决交给现成的理论框架，把生成交给理论自带的推论链条，而使用者自己，只是在挑选。这是这个判断最容易捕获自己使用者的陷阱，也是本文必须在结尾处祭出的最严格的自我指涉的警告。

但这一切，并不构成对未来的盖棺定论。本文所揭示的这种机制，所预判的那些“从未被激活的器官”，都依附于一个可被检验的前提：决-生成结构的不可代偿性——即裁决与生成必须在同一个人身体里、在同一次动作中发生，才能激活某种特定的创造能力——是在特定技术-社会条件下被观察到的一种稳定的发生学关联。这个关联是否必然——是否在一切可能的技术条件下都不可被绕过——是一个开放的经验问题。

因此，本文的判断需要接受严格的证伪条件的检验。如果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不是指一两个孤例，而是作为一种结构性的现象——可以实现以下条件中的任意一组，本文的核心前提就需要被重新审视：第一，一批裁决与生成从未在自己身体里同时发生过的创作者，持续地产出了一批被同行评议者（不知晓创作者背景和理论前提）在随机化对照实验中显著评价为更具“内在必然性”和“不可替

代性”的作品，且这种评价的效应量在控制创作类型、文化背景等变量后仍然稳健；第二，在严格控制的纵向教育实验中，经历了完全代偿裁决-即-生成（即从未被放置到生成性磨难中）的学习者，在后续的创作任务中表现出的“从混沌中自行裁决-生成初始差异结构”的能力，与对照组（经历过生成性磨难）无显著差异。如果上述条件被满足，那将意味着裁决与生成之间的那条纽带——人类在漫长的创作史中用无数个黑夜、无数段沉默、无数次孤独的裁决-生成去守护的那个“同时”——并非不可被代偿。

但即使在那一天到来之时，本文所提供的基本发生学框架——裁决与生成的同一性、代偿位置的上下游之别、拆开裁决与生成的发生学后果——仍然可以作为理解这一历史变迁的分析工具。因为它所描述的，不是一种必须被固守的旧形式，而是一组可被观测、可被检验、可被局部修正的发生学关系。关键在于，这些关系本身的变迁轨迹，也必须用发生学的方式去追踪：不是哀叹旧事物的消逝，也不是欢呼新事物的降临，而是追问——在新的条件下，裁决与生成是又被拆开了一步，还是以一种我们尚未认出的形态，重新汇合为了同一个人的同一个动作。

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如果你读到这段话，并且你是一个创作者——在你有能力为自己做出裁决的通道尚未被完全拆开之际，请你下一次面对空白的画布、空的乐谱、空白的文档时，试一次。什么都别问，什么都别查，什么都别让任何一个工具替你“先出几个方案看看”。就独自坐在那片混沌里，感到恐惧也没关系，一笔都画不出来也没关系。然后，在某个你自己也无法预知的瞬间，自己踩下去那一脚。踩错了也无所谓。那一脚，不是通往你作品的一步。那一脚，就是你作品发生的那个不可代偿的位置。它不是某个已逝去的黄金时代的遗物，它是你作为一个创作者，在一切条件都试图替你省掉它的时候，仍然可以为自己守护的、那个让裁决与生成在你身体里重新汇合为同一个动作的发生学可能。

附论一·最近邻切割：决-生成不是什么

正文第三节已与布迪厄的实践感、杜威的做即知、梅洛-庞蒂的身体图式逐一切分。但还有两位对手没有被请出来，而它们比那三位更贴身：一位在两百多年前就命名过“在无规则处给出规则”，另一位则专门研究“技术把人的某项能力外化出去”会发生什么。不处理它们，本文的命名会被合理地怀疑为旧词新装。

（一）与康德「天才」的切割：禀赋，还是发生位置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给出过一个几乎正对本文靶心的判断：美的艺术不能按既有规则制作，因为它所依据的规则无法从任何现成规则推演出来；能够为艺术**给出规则**的那种才能，他称之为天才。“在无路处裁出一条路，而这条路在被裁出之前并不存在”——本文的这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安进康德的天才论里。若两者可以互换，本文就只是给天才换了一个更技术化的名字。

分离线在**它是谁的属性**。康德的天才是**主体的禀赋**：它由自然赋予某些个体，不可教、不可学、不可传授，其存在只能由作品的示范性来事后确认——我们是看到了典范作品，才回溯地认定那里有过天才。天才因此是一个不可被制度触碰的东西：你无法剥夺一个人的天才，也无法把天才装到另一个人身上。本文的决-生成不是禀赋，而是一个**发生位置**：它不属于某些人，它是任何人在无路处不得不亲自踩下那一脚时所占据的那个位置；它可教（通过把人逼到那个位置上）、可被剥夺（通过在裁

决与生成之间插入一个第三者）、可被观测（通过它是否被激活）。正因为它是位置而不是禀赋，它才可能被一台机器摸到——而康德的天才在概念上根本不可能被任何工具触碰。

可裁决差别由此而来：康德式框架预测，AI 的普及不会改变天才的分布，只会改变作品的面貌——有天才的人照样会做出典范作品，只是用了新工具。本文预测：在深度代偿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创作者中，**典范作品的产出率会与从业者的先天差异脱钩，而与其早期是否经历过强制的决-生成情境相关**。若追踪显示典范作品的出现仍主要由个体差异解释、与训练阶段的代偿程度无关，本文应当让位于康德式解释。

（二）与斯蒂格勒「代具」的切割：一般化的外化，还是一次特定的拆开

正文第四节写道"正如书写技术外化了记忆"，并称这一洞见来自"当代技术哲学"。这一匿名指称须被点名：它属于贝尔纳·斯蒂格勒（承勒鲁瓦-古朗），其核心命题是人本质上是缺陷性的存在，必须依靠体外的技术器官（代具）来完成自身，技术因此不是人的工具而是人的构成条件；每一次技术外化都同时是一次能力的获得与一次能力的失去（柏拉图笔下书写之于记忆的那个双面性）。本文若不与它划界，就只是这一命题在艺术领域的又一个例子。

分离线在**外化的对象是能力还是同一性**。斯蒂格勒处理的是**能力的外化**：记忆被外化到文字里、计算被外化到算盘和芯片里，人失去某种熟练，同时获得一种新的组织方式，这个过程是可逆的、可再内化的，也是文明得以积累的方式。本文主张的不是又一次能力外化，而是一次**同一性的拆开**：被拆开的不是"裁决能力"或"生成能力"中的任何一项，而是**裁决与生成在同一个动作中重合**这件事。两种能力都还在——创作者的判断力甚至更好了，生成效率甚至更高了——被拿走的是它们的重合。这一区别有一个直接后果：能力外化会留下"我不会了"的自觉（会写字的人知道自己心算变差了），而同一性拆开不留下任何缺失感，因为两项能力单看都没有退化，人只是从来没有到过那个必须让它们重合的位置。

可裁决差别：斯蒂格勒式框架预测代偿会伴随可自陈的能力萎缩感，且移除代具后旧能力可在训练中回升。本文预测：深度使用者的自陈中**没有能力萎缩**（他们通常报告"我做得更好更快了"），出现的是意义层面的空转（"这些判断不是我的"）；而移除工具并不足以恢复，必须把人重新逼进不得不裁决的处境中。若实证显示深度使用者主要报告的是能力退化而非同一性空转，本文的框架应被斯蒂格勒式的代偿框架吸收。

（三）与本栏接收端诸篇的分工，以及一个关键词的交代

本文关键词里写着"不可代偿性"，而作者已在本栏发表过《工序的不可代偿性》——那一篇处理的是**接收端**：作品交出去之后，接收者必须亲自跑完的那道工序不能被代劳。本文处理的是**创作端**：作品被做出来之前，裁决与生成必须在同一个身体里重合。两处用了同一个词，指的是两个不同位置上的不可代偿，必须说明，否则站上会出现两个词形相同、对象不同的概念互相污染。同理，与《先占》《不可代理的残余》《无薪的劳作》的关系也是"两端"关系而非层级关系。

本分工可被反驳的方式很直接：若能证明**创作端的决-生成损害可以通过接收端的干预（改善作品被接收的条件）得到缓解，或者接收端的不可代劳其实由创作端的决-生成程度决定，那么"两端"就不是两端，而是一条链上的前后段**，本文与那几篇应当合并重写为一个统一模型。

附论二·可裁决预测：本文可以在哪里被判错

正文第七节已给出证伪方向。此处补三条更具体、可独立实施的预测。

预测一（上游／下游的分界）。把创作工具按"介入位置"分为两类：只在裁决之后执行（数位笔、雕刻机、修图工具）与在裁决之前提供成形方案（生成式模型）。本文预测：前者的深度使用与决-生成损害无关，后者相关；且相关强度随"方案成形度"（从关键词提示到完整成品）单调上升。若两类工具的效应无差别，本文关于"第一台摸到上游的机器"这一历史断言即被推翻。

预测二（拉锯的有效性）。正文承认存在一种反例形态：创作者与 AI 反复拉锯、每次否定方案后回到自己的混沌中重新裁决。本文预测这一形态**确实有效但极其稀少**，且其有效性取决于一个可测变量——每轮拉锯中创作者**自己产出而非挑选**的方向假设数量。若大规模观察显示深度拉锯者普遍不产生决-生成损害，而与该变量无关，则本文对"拆开"的判断过强，需要收缩为一个关于使用方式的经验命题。

预测三（教育学的复现）。本文在教育学与治理术中认出了同构结构。可检验的推论是：在被托管了方向的学习环境中长大的学生，其"能判断但提不出问题"的比例应显著高于对照组，且这一差距在提供更多优质方案示例时**不会缩小反而扩大**（因为示例进一步替代了裁决）。若增加示例能缩小差距，则同构判断不成立，本文第六节应当删去。

参考文献

- Bourdieu, P. (1980). *Le Sens pratiqu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 Dewey, J. (1934). *Art as Experience*. New York: Minton, Balch & Company.
- Gettys, C. F., & Fisher, S. D. (1979). Hypothesis plausibility and hypothesis generati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24(1), 93–110.
- Gibson, J. J. (1979).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Klein, G. (1998). *Sources of Power: How People Make Decis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Merleau-Ponty, M. (1945).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Paris: Gallimard.
- Simon, H. A. (1973). The structure of ill-structured problem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4(3–4), 181–201.
- Kant, I. (1790/2000). *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 (P. Guyer & E. Matthews,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6–§ 50 关于天才为艺术给出规则；本轮所对质的最强对手)
- Stiegler, B. (1994/1998).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R. Beardsworth & G. Collins,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代具与第三持存，正文第四节此前的匿名指称即此)
- Leroi-Gourhan, A. (1964/1993). *Gesture and Speech* (A. B. Berger, Tra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